

萧红作品与人生的双重误读

崔思晨¹

【摘要】 萧红的一生在关于萧红的传记书写中经历了传奇化历程，萧红作品亦因作家的传奇经历蒙上了一层宿命论色彩。通常，学界对这位女作家经历本身的关注更甚于其作品，萧红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一直成为研究者们解读其人生和思想的主要文本，并在传记写作中成为传记作家引用的材料。传记写作通过传记契约实现真实性，而文学作品则以自传空间追求终极真相。一直以来，人们对萧红的人生和作品都存在双重误读，萧红作品在人们对其人生经历的找寻中被误读，萧红人生与萧红传记的叙写之间亦存在事实性错位。

【关键词】 萧红 传记 《商市街》 《呼兰河传》 《生死场》 误读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 (2022) 06-0113-07

萧红的作品一直与其人生经历紧紧相连。作为作家，萧红得到了较高评价：“她以个人的孤独承受并昭示了整个女性群体那亘古的孤独，她以自我一己的牺牲宣告了我们民族在历史前进中的重大牺牲——反封建力量的、人的牺牲；她以自己短促的痛苦的生命烛照着我们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缺损。”^{[1] (p205)} 萧红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一直是解读、评价萧红的主要文本，并由此承担了传记的某些功能，传递出“小说比传记更加真实”的信号。¹ 在传记写作中，萧红的作品往往被视为母本，为传记作家建构传主形象提供传记材料，这不仅模糊了文学作品与作家真实经历之间的界限，而且造成了对萧红作品和人生的误读。

以往的研究集中于探讨传记中的萧红形象，指出萧红的人生存在着被建构的现象，认为这一建构最终指向了传记作者的传记意识。² 此外，亦有关于萧红传记传播与接受的考察，³ 以及以萧红传记为案例的系统性传记研究。⁴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传记文体的概念，明确了传记的文体价值。但总体来说，萧红传记与萧红作品的对照研究仍有相当开拓空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将传记研究融入作品研究，进一步探讨传记契约下的传记价值，同时寻找传记作为独立文本的独特意义。⁵

一、《商市街》与传记契约

菲利浦·勒热纳认为自传中存在自传契约，并将自传中的同一性（即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三者同一）视为自传契约中的主要部分，而同一性中人物名与作者名的相等在他看来更为重要。“所谓自传契约，就是在文本之内对这种同一加以肯定，它最终指向封面上作者的名字。”^{[2] (p117)} 自传契约是作者在进行自传写作时实现的作者、叙述者和自传中人物的三者同一。由自传契约的同一性可以推出传记写作中同样存在着传记契约。传记契约与传记作者的传记意识相关，是作者在传记写作中有意或无意间遵循的写作原则。明确而成熟的传记契约对于传记文体的确立和文体价值的展现有着重要作用。但在萧红传记的写作中，作者有时存在着传记意识模糊的情况，以致模糊了自传与自传性作品的概念边界。应该明确的是，萧红作品带有的自传性并非意味着作品即自传本身。

《商市街》出版于1936年8月，彼时萧红身在东京。人们通常将这部散文集看作是萧红在与萧军的感情创伤中对往昔生活的追忆。但事实上，《商市街》是萧红立足文坛的初始之作，在写作《商市街》的过程中，萧红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并确立了独立的书写态度。《商市街》写作于1935年3月至5月，1935年3月，初到上海的二萧受到了鲁迅先生的邀请，与茅盾、叶紫、聂绀弩等人结识。此时《生死场》尚未出版，萧红还没有在上海文坛立足的作品。在鲁迅推荐下，萧红于3月5日在《太白》第一卷第十二期发表了一篇散文《小六》（后收录在《商市街》中）。这段时间的写作对于萧红来说是一个迫切的表达出口，她需要

作者简介： 崔思晨（1994—），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通过写作获得收入改善与萧军的生活，也需要用文字让文坛感受北方来客的独特与魅力。出于被文坛接受的渴望，萧红在《商市街》的多篇散文中带来的是来自底层的经验，是知识分子难以接触到的真实困苦。萧红真切体会过饥饿，她在《饿》中一连串的追问展现着她对饥饿的深层体验；萧红也真实感受过孤寂，《他去追求职业》中来往的声音与隔绝的环境实际上照见着她渴望人群却又疏离于人群的矛盾。《商市街》中的情景与萧红在上海的生活有某种相似性，谋求生计、交际寥寥、故土之思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商市街》的写作动因。

那么《商市街》中的叙述者是否就可以被视为是萧红本人？叙述者与作者本身是否在此重合？考察《商市街》可知，作品的叙述者是“芹”或“我”，而作者的署名为“悄吟”。作者身份是对“整个书面文本陈述行为的最终责任者”，^{[2] (p113)}而“使用化名的往往是一些孤立的写作，几乎从来不是某位作者宣称自传的作品”。^{[2] (p115)}因此，即便《商市街》与萧红本人经历的相似性很高，但仍然无法达成自传具备的同一性，不应被视为自传。“萧红”虽然也是笔名，但已经是被社会认可的确切身份，指向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萧红”的名字常常作为新闻报道选择的身份指向，如《社会日报》曾刊载了题为《萧军与萧红》的文章。^[3]《商市街》中的散文发表在不同刊物上，如《中学生》《文学》《文季月刊》等，署名均为“悄吟”。在此期间，萧红发表的其他作品的署名却是“萧红”。如《文季月刊》第1卷第3期“随笔”栏目刊登了其《十三天》《最后一星期》两篇文章，署名是“悄吟”；^{[4] (p604-606)}《文季月刊》第1卷第5期“小说”栏目刊登了其作品《牛车上》，署名却是“萧红”。^{[5] (p933-939)}在同一段时间内，作品的不同署名折射出《商市街》的虚构性，恰恰说明萧红的散文与自传不能等同。“悄吟”并不直接指向真实的作者身份，而是萧红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身份寄托。

《商市街》的写作，是萧红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出现在上海的萧红，在外人看来是萧军的附庸。⁶但萧红从未承认自己是弱者，即便萧军一直这样认为。⁷萧红身体的虚弱并不代表性格的脆弱，相反，在等待与煎熬中成长起来的她，性格中有着倔强与顽强的一面。萧红在作品中以叙述者的口吻道出自己的态度，《欧罗巴旅馆》讲述的是女子刚刚被爱人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生活，话语间并没有充满恋人相聚的甜蜜，而是毫不客气地直面苦涩的生存困境以及爱人的性格弱点。在《商市街》中，萧红通过叙述者的回首，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位置，找到自我的价值。萧红感叹二人同病相怜的命运，也揭开感情中的危机。《商市街》所展现的，不是一对爱人在艰苦的岁月中如何相互扶持、度过困苦，而是两个性格相异的人在乱世中抱团取暖的磨合过程。但叙述者和作者身份并非完全重合，《商市街》中隐含的不仅仅是萧红与萧军感情裂痕的预兆，还有萧红在写作中的自我重塑和对叙述者形象的建构，这成为《商市街》的作品魅力所在。

如果将某一作品视为作家的自传，那么即便文本中出现了与作者经历不符的内容，也无法否定其真实性。因为作者的陈述行为是真实的，即便其中有“出错、撒谎、遗忘或歪曲”之处。^{[2] (p135)}但是人们常常将萧红带有自传色彩的散文认定为其对过往经历的回忆，甚至将散文直接作为传记材料引用。事实上，自传性作品并非自传，《商市街》中的某些叙述可以作为传记的素材，但并不能直接视为作者的真实经历。有的萧红传记在写到萧红与萧军相遇后的生活时，直接用《商市街》中的大量片段还原萧红当时的心理。事实上，萧红仅仅从哈尔滨的生活经历中截取了她认为适宜讲述的片段，散文中的内容与萧红的生活之间有着相似性，但并没有同一性。出于感染读者的目的，作品存在着一定的虚构。如《广告员的梦想》《又是冬天》中提到的老秦可以让人联想到萧红的好友金剑啸，但“芹”的伴侣则是虚构的“蓓力”，将散文与自传分而论之，才能还原作品的艺术魅力。

“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都应该将其视为作者有意识创作出来的作品世界来解读。”^{[6] (p79)}对于传记写作来说，传记作者所看重的真实性应在于情感的真实而非事实的真实，因此，引用萧红作品的出发点应在于作品中传递的萧红的心理成长和变化。

写作《商市街》是萧红面对内心声音与原始本能欲望的过程，在等待与饥饿中，萧红与自己对话。她观察行人、商贩甚至乞丐，她能够清晰听到窗外的行乞声、走廊里的脚步声，萧红的感官在封闭的空间内被激活，感知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被深化。一直伴随萧红的是“肚痛，寒冷和饥饿”，^{[7] (p121)}这些细节被她捕捉到笔端，成为打动人心之处。在外人看来，虚弱、不能自谋生路的萧红由萧军解救是圈子内的佳话，感情上缺损的她需要一个人守望相助，但当萧红回首自己的哈尔滨经历时，个体性的沉思多过依附于他者，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凸显。萧红在作品中强调的是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以此对抗着将她认定为萧军情感附庸的世俗目光。在《商市街》中，萧红的叙述视点由对自我的感知转移至更多的人世苦难上，被冻死的小鱼、锯木料的老人、春天

里拉琴的盲人……萧红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比自己更为艰难的生存境地，扩展了作品叙事的空间和容量，同时也将作品提升到表现人民生存困苦的高度，展现了作品的群体关怀。

《商市街》的价值在于其间体现的个体存在感已经超越了作者的真实经历。从《欧罗巴旅馆》开始，到《最后一星期》结束，其中潜藏的“归来—离开”的往复是萧红一生旅程的注脚。萧红有自己的叙述底线，她隐去了被困、生产的经历，就像从未在文章中出现过的汪恩甲一样，她清楚不是所有的经历都适合写进作品。这样有所保留，又有所侧重的散文集，不能描绘萧红在哈尔滨生活的全部图景。因此，应将《商市街》置于散文的空间探讨，而不应仅仅把它当作萧红的生平资料，以误读遮蔽作品原貌。

二、《呼兰河传》与自传空间

萧红的自传性作品之所以被误读为自传，与作品中构建的自传空间有关，萧红通过对个人经历的加工、修饰，使作品呈现出真实观感。自传空间是一种间接的传记契约，也即假象契约。所谓假象即是区别于真实经历的，有着一定虚构成分的叙述，假象意味着虚构的存在，文本中的虚构性在自传空间中得以延展。自传空间使得作者的创作观念隐于作品之中，萧红通过自传空间实现了更加自然、流畅的作品叙事。在《呼兰河传》中，自传空间的构建揭示了作者文化批判的主题，同时也显露出文本虚构的底色，自传空间的存在拉开了作品与自传的距离。小说中描述的是“对个人具有揭示作用的假象”，其背后目的是展现文本追求的终极真相。^{[2] (p138)}《呼兰河传》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以家庭为叙述圆心的结构安排，是作者在自传空间中的有意选择，以更加自然的方式传达出作者文化批判的用意。正因如此，《呼兰河传》并不仅仅是作家对童年经历的记录，“一概认定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一概把作品中的人事和作家的关系看作是恒等式，一概从自传的角度去诠释作品中的艺术问题”的误读应该得以正视。

^{[8] (p132)}

《呼兰河传》是萧红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长篇作品之一。将《呼兰河传》视作萧红追忆童年与故乡之作，始于茅盾的“寂寞论”。在他看来，作品没有表现出“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是写尽了萧红童年的寂寞和心境的寂寞。^{[9] (p259)}事实上，茅盾已经关注到《呼兰河传》中文化批判的深度，他认为小团圆媳妇的悲剧表现出萧红在悲壮大时代中的斗争，同时也注意到小说中的讽刺和幽默，小城故事在他看来体现着“病态的美”。但茅盾却没有深入挖掘，而是笔锋一转，回到寂寞的主题上。与其说茅盾是在解读《呼兰河传》，不如说茅盾是借这篇序言抒发自己当时的苦闷。1946年的茅盾经历了夏丏尊、陶行知等多位友人的离世，也看到了热血青年在国民党的残暴镇压中失去生命，茅盾在此期间撰写了《为“一二·一”惨案作》《关于广州“五四”暴行》《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我们有责任使他永远不死》等多篇文章，表达了他对人民艰难处境的关心和继续革命的决心。革命战友相继离开，留下的人要继续面对明天的未知，现实未免使他觉得孤寂。1945年，茅盾女儿沈霞的离世同样给这位父亲带来了沉重打击，可以说，茅盾对于萧红离世的惋惜之情，除了来自对文坛之星陨落的痛心，也有对近年经历的感叹。他反复提到的寂寞，更多是彼时心境的寂寞。

实际上萧红在《呼兰河传》中通过虚构营造出自传空间，完成了自传性作品文化批判的内涵转换，这一巧妙设置，使得文本结构流畅自然，同时也极贴合她的创作风格。1940年7月1日，杨刚在《文学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的文章，认为作家不要一味书写思念故乡的作品。^{[10] (p69)}而彼时在香港的萧红却反其道而行之，显示了她独特的创作观。在她看来，“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11] (p253)}如果说写作《生死场》时的萧红仍然处于写作的试验阶段，那么到了写作《呼兰河传》时，萧红的写作技巧已经相对纯熟。创作的巧妙之处在于其所写的既是萧红熟悉的家乡，也是以自传空间建构起的人性反思的试炼场。

萧红笔下的呼兰小城与1933年的呼兰县城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比如东二道街南边的确有萧红就读的龙王庙初级小学，但是没有提到教授养蚕的事情；北面的城隍庙内的两级小学在地图上无从确认，……《呼兰河传》中也没有提到从呼兰车站过来首先映入眼帘的天主教堂”。^{[6] (p269)}带有一定虚构的呼兰小城构成了文本的自传空间，而自传空间的圆心则是故事中的家庭。有

关家庭的描写在萧红其他作品中也出现过，如《小城三月》中较为开明的家庭教育观念和聚会，表现出温情的家庭生活。而在《呼兰河传》的故事中，祖母、父亲都是“我”不喜欢的，祖父早早离开之后，“我”成了家里的遗忘者，热闹的折腾更显得童年的寂寞。虚构后的故事将现实的距离拉开，张秀琢在《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中说，萧红父亲对女儿经常挂念，也曾写过对联怀念女儿。如今的萧红故居中仍然可以见到张廷举所写的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歿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置于屋内桌案之上。

萧红选择从童年回忆中不断开掘适合表现主题片段，对其重新加工，嵌入不同的自传空间。家庭是她叙述的出发点，是自传空间中的圆心，由此辐射至乡间百姓的人生无常。由《王阿嫂的死》《夜风》《牛车上》《马房之夜》等从家庭里走出的故事，到《后花园》《小城三月》，家庭的叙述脉络在萧红笔下已渐渐清晰，自传空间的建构则从凌厉逐渐走向温情，从侧面表现出萧红不同时期的家庭观。

萧红在自传空间中塑造了贴合文本价值观念的人物形象，以完成对文本终极真相的意义追寻。《呼兰河传》中的有二伯虽然生活在家庭之中，却游离于家庭之外，作者为其古怪的性格抹上一层没落知识分子的色彩，有二伯的悲剧一方面在自传空间的真实氛围中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也解释了萧红文化批判的用意。《呼兰河传》中的有二伯被塑造为自作自受、嘴上好强的形象，与另一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中粗鄙又不被人同情、最后被捉弄而离开张家的形象有所不同。可见，在不同的自传空间中，由于萧红对终极真相的不同命意，人物形象也有相应调整。

《呼兰河传》中的终极真相最终指向作者的文化批判，而这一点又通过对家庭的描写揭示。《呼兰河传》中的大家庭是张家，小家庭包括冯歪嘴子家、胡姓一家、栓车的一家、养猪的一家等，悲剧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家庭中展开。小团圆媳妇的故事最能体现出萧红文化批判的深度。小团圆媳妇一出场就生活在大家的目光之下，她心理和身体的健康在呼兰小城是一个错误，她爱笑，个子高，胃口好，但到了新的人家，就要领受下马威。对于胡家婆婆来说，打媳妇是天经地义的，是平淡生活的调剂。小团圆媳妇的哭声是整个冬天的伴奏，除了孩子害怕，大人们仍麻木生活着。小团圆媳妇的病展现出当时愚昧的社会图景，小城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谈资，他们为此而兴奋，这些被生活消耗掉大半热情和期待的灵魂在小团圆媳妇“还求救于人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上前去帮忙她，把她从热水里解救出来”。^{[9] (p193)}待到小团圆媳妇昏迷过去之后，人们才要去救她，并且为年轻生命的逝去心痛起来。这段故事的原型与作者的真实经历有一定重合，由此构建的自传空间便延续了真实性，同时也通过作者的渲染增加了可感性，自传空间让读者更加容易接受作者传达的文化批判内涵，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在自传空间中有了更加立体生动的表现效果。

在自传空间中，萧红并非以高蹈的姿态对呼兰人的愚昧、麻木等劣根性加以抨击，而是从民间性的视角讲述故事，以贴合整部作品自然流畅的叙事。在其他作家思考怎样让创作融入抗战的时代主流时，萧红选择用超越时代的视角来回应这个话题。她知道战争的场面自己抓不住，但生活可以，作品因而具有了跨越时代的永恒品质。民间的写作视角意味着直面故事中的粗野、落后和劣根性，萧红没有着意粉饰呼兰人们性情中善良美好的一面，而是直接撕开一个口子，让人感受这片土地上近乎凝固的落后意识和吹不透的封闭之墙。事实上，萧红无意于以此来表达某种启蒙的愿望，而是将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差异放大。在自传空间的建构中，萧红得以灵活、自如地表达出走于启蒙思潮下的游子对故土和人性更为深刻的思考。

三、传记意识与传记材料

萧红的作品在人们对其人生经历的找寻中被误读，同样，萧红传记在叙述传主经历时，也扭曲了萧红的人生形象。作家传记的写作存在特殊性，“传记对作品的分析往往与作家的人生经历、社会环境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运用作品信息考察作家的生活，探寻作家成就经典作品的缘由甚至是重要作品对作家人生命运的影响等”。^{[12] (p108)}在萧红传记的写作中，传记作者对传主作品的过度引用，在进一步强调萧红作品与萧红自身经历具有重合性的同时，也将萧红的真实人生简化、模式化。在萧红传记写作中，传记作者往往大量引用传主的文学作品，使得传主形象与萧红笔下的叙述者高度重合，传记由此成为传主笔下文学世界的延伸，从而动摇了作者的传记立场。

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中认为：“传记事实，狭义地说，是指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13] (p14)}不同传记作者对传记材料的相异处理反映出不同的传记意识，他们共同形成了传记契约。如一些传记中大肆渲染的片段，包括萧红与祖父之间的感情、萧红与萧军同甘共苦的经历等，在另一些传记中却作弱化处理。⁸因此，传记意识决定着传记写作将展现怎样的传主人生。

萧红传记中塑造的萧红形象多带有悲情或倔强色彩，萧红的情感经历成为传记中放大和渲染的部分。如在传记《我本一无所恋》中，萧红敏感、脆弱，延续了以往传记中的悲情形象。传记中频繁写到萧红的眼泪，“泪水从脸颊滑落，润湿了字迹”，^{[14] (p153)}“泪水流了下来，酒精开始搅动肠胃”，^{[14] (p141)}“回到空无一人的半地下室，脸上的泪水早已结冰”，^{[14] (p179)}“我切实感受到了什么是心痛，双手抚着胸口，趴在被垛上放声大哭”^{[14] (p279)}，“下午哭过之后，我感到精力耗尽，做好晚饭便回房躺下”，^{[14] (p325)}“不断涌出的眼泪滴在信笺上，浸渍了大片文字”。^{[14] (p333)}传记中的情节与萧红散文《镀金的学说》《初冬》中的内容有着重合性，传记作者抓住了萧红在散文中表现的心理波动，将其在传记中放大。散文中主人公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在传记中被叙述为家庭影响传主性格的起因。另一部传记《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则参考了散文《初冬》《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主人公决绝离家的经历以及由此传递的萧红对家庭的观念和情感，塑造了倔强的萧红形象。《人鸟低飞》将传主性格形成的原因归于萧红一生的颠沛流离。与《我本一无所恋》中传主对于家庭恩怨的理解不同，《人鸟低飞》中的萧红对于人生的每一步选择都有一定动因，“是我爹，逼我走出了这个家门”，^{[15] (p64)}萧红倔强的性格使她一生的出走都变得不平凡。

萧红作品片段在萧红传记中的再现，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传记文本的文学性，体现了传记作者对萧红作品中自传空间的认可，但文学作品的大量引用影响了传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此，传记作者在追求笔下传主形象丰满的同时，也应注意传记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独有价值。《从呼兰河到浅水湾——萧红传》中引用了《呼兰河传》和萧红的一些散文中讲述的童年生活，称它们“成了萧红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忧伤”。^{[16] (p6)}作者透过《呼兰河传》的故事放大了萧红童年生活中不幸的部分，并且将萧红在作品中对于女性命运的理解与故事中所展现的童年创伤相联系，“回首以往，拣拾童年生活的碎片，她除了怨艾，除了痛，除了恨，更有了一种理性的归结”。^{[16] (p7)}作者在叙写萧红的成长经历时，一直将家庭矛盾放大，强调家庭对萧红带来的伤害，这无疑受到萧红作品的影响。如作者将萧红作品《祖父死了的时候》中主人公与父亲关系的僵化视作萧红人生不幸的原因，认为“在她的心灵深处，父亲一直是她的暗伤”。^{[16] (p14)}由此，萧红家庭的真实情况在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失真，传记立场中应坚守的真实性原则在对文学作品的引用中逐渐模糊。

萧红在作品中的自传空间源于其真实经历，但完全依照萧红作品中的自传空间书写传记，则缩减了萧红的人生容量。萧红既是作家，又是经历过战争和流离的真实的人，创作当然是她人生中的重要部分，但萧红在创作以外的生活，同样是影响这位作家性格形成和人生走向的重要因素。丁言昭在《萧红传》中以更多史料展现了萧红在哈尔滨时期的生活，远远超出《商市街》的内容范围。萧红与文学圈以外友人的交往同样展现出萧红不同的侧面，如传记中提到了萧红与演员贾容及其朋友的交往，“贾容经常去萧家，有时，他们没钱花了，就让贾容帮他们去当衣服，有了钱又让他们把衣服赎回来”。^{[17] (p52)}可以看出，虽然当时萧红经济拮据，但仍然交游广泛。丁言昭通过还原事实，坚守了传记写作的真实性原则，同时也体现出其较为成熟的传记意识。

又如，萧红成长于宠溺的家庭氛围中，这成为萧红执拗性格的渊源，^{[18] (p106)}这是萧红文学作品中不曾体现的。传记作者在写作中应坚持还原事实的原则，剥离萧红作品中的虚构，如其小说中对祖母的印象源自儿童视角，并不能因此断定萧红的祖母对她不好。与《呼兰河传》中表现出来的荒凉相反，萧红生活在热闹的家庭中，萧红的文学启蒙不仅仅来自作品中提到的祖父与大伯，常来家中聊天的邻居也为萧红的写作提供了素材。^{[19] (p4-21)}萧红和萧军离开哈尔滨既有中共的支持，^{[20] (p10)}也有黄之明、袁淑奇等朋友的帮助，^{[21] (p69-70)}二萧到上海的路费也是朋友赞助的，^{[22] (p58)}可见二人当时的生活并不完全如《商市街》中所述那般拮据。

那么，坚持真实性原则的传记写作，应怎样完成作者传记意识的表达？平石淑子的探索或可为我们提供借鉴。她在没有引用萧红作品的情况下，尝试以当时的政策、地图、报告等资料更加严谨客观地还原历史背景。如在介绍萧红入学情况时，以《“满洲国”各县视察报告》及报告中的《呼兰县立学校一览表》表明萧红就读的呼兰县立第二小学的教育水平在全县较高。又引蔡元培等编《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中全国二十六省女学生在籍情况，得出当时黑龙江省的教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结

论。^{[6](p41-44)}由此平石淑子认为,萧红在学生时代接受了与同龄人相比较高度的教育。平石淑子的做法提示我们,对于传记来说,文学性是传记区别于历史资料的重要特征,而真实性和客观性则是传记与一般文学作品保持距离的重要条件。传记写作既要有历史材料的坚实支撑,又可适当引用传主作品填充一定程度的文学血肉,以丰富传记叙述层次,生动还原传主某时的心境,增添传记的文学性,更加丰满地展现传主的人生轮廓。

材料的合理运用既能传递传记作者的传记意识,也有助于实现传记追求真实的文类价值。部分优秀的传记作品在引用萧红作品时,厘清了作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体现了作者的思辨意识。比如叶君在叙述萧红童年经历时引用《蹲在洋车上》的情节,对萧红备受争议的家庭恩怨给出了合理解读:“不可忽视的是,接连不断的家庭变故让这位父亲在很长时间可能没有好的心绪,作为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自然无法体察。”^{[23](p15)}此前,萧红作品中出现的冷漠而古怪的父亲形象一直被认为是真实的,以往的传记作者常常将萧红父亲的形象脸谱化。而叶君通过梳理事实,认为萧红家庭中母亲、祖母、祖父的相继离世,对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而言是不小的打击。萧红的父亲本身不善于料理家庭琐事,没有女主人帮忙的他,既要顾及工作又要照顾家庭,一时间焦头烂额,很容易忽视子女们的感受,这些是童年萧红不能理解的。

综上所述,许多传记作者过度依赖萧红的作品来还原其某一阶段的生活经历,使得萧红作品成为传主人生的注脚,导致萧红的人生和形象遭到了曲解与误读。有鉴于此,作家传记的写作在材料运用上要在充分体现作者传记意识和立场的情况下为传主人生的解读提供客观视角,实现传记研究与作品研究的结合。

参考文献:

-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2][法]菲利浦·勒热纳.自传契约[M].杨国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3]萧军与萧红[N].社会日报,1936-06-26(03).
- [4]悄吟.随笔两篇[J].文季月刊,1936,(3).
- [5]萧红.牛车上[J].文季月刊,1936,(5).
- [6][日]平石淑子.萧红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7]萧红.萧红全集:散文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 [8]王科.“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J].文学评论,2004,(4).
- [9]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I[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 [10]杨刚.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M]//文通学社.历史的轨迹1939-1950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文艺通讯部、香港青年文艺研究社、香港秋风歌咏团纪念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 [11]萧红.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 [12]赵焕亭.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 [13]赵白生. 传记文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4]叶君. 我本一无所恋[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
- [15]王小妮. 人鸟低飞: 萧红流离的一生[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 [16]蒋亚林. 从呼兰河到浅水湾——萧红传[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 [17]丁言昭. 萧红传[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 [18]黑龙江呼兰河萧红研究会. 萧红身世考[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3.
- [19]铁峰. 萧红文学之路[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1991.
- [20]包子衍, 许豪炯, 等. 罗烽谈他早期的革命和文学活动[J]. 新文学史料, 1991, (3).
- [21]萧军. 萧军全集: 第17卷[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 [22]鲁海.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J]. 图书馆杂志, 1984, (4).
- [23]叶君. 从异乡到异乡: 萧红传[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注释:

1 由于萧红作品带有自传性, 很多传记作者将萧红作品中的某些片段视作萧红的真实经历, 并在传记中加以记叙。如袁权认为萧红的《弃儿》是“关于萧红早年生活的极其重要的文章”, “完全可以作为第一手资料对待”。参见袁权:《萧红全传从呼兰河到浅水湾》,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第34页。

2 相关的研究有彭依伊:《萧红“强”、“弱”形象探析》, 载《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3期; 李璐:《作家萧红的“个”的自觉——论平石淑子〈萧红传〉对葛浩文〈萧红评传〉的反叛》, 载《上海鲁迅研究》2021年第1期; 孙琦:《共生与重构——论新世纪以来的萧红生平叙述》,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年; 王骅:《众声喧哗“说”萧红——萧红传记解读》,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年; 等等。

3 如朱晓晨:《新时期以来萧红接受研究——以萧红传记的写作为中心》, 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年; 张立群:《“萧红传”的历史化与经典化问题分析——兼及萧红研究的若干问题》, 载《传记文学》2020年第8期。

4 如赵焕亭:《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朱旭晨:《秋水斜阳芳菲度——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6年。

5 本文所探讨的“传记契约”是菲力浦·勒热纳提出的“自传契约”的衍生, 是在自传理论的基础上拓展至传记总体研究的阐述。

6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最先提出, 萧红在与萧军的感情中是附属品的存在。参见骆宾基:《萧红小传》, 建文书店1949年

版，第90页。

7 萧军在《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说：“我从来没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对于弱者我是能够容忍的，甚至容忍到使自己流出眼泪，……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可见，萧军以强者自居，将萧红身体的弱点与性格上的“弱”相等同，自己在感情中的付出在他看来是居高临下的，充满悲悯的，而非爱人之间的平等相待。参见萧军：《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

8 在葛浩文《萧红传》、丁言昭《萧红传》等传记中，关于萧红祖父的叙述较为简略。季红真在传记中试图引用《欧罗巴旅馆》《破落之街》《家庭教师》《雪天》等多篇散文以及铁峰、陈隄的资料还原萧红与萧军的苦难生活。但这样的片段却在平石淑子的《萧红传》中只字未提，在葛浩文的《萧红传》中也只是简略提及。